

十年谈

当代文学名家专访

吴小攀 著

林贤治

洛夫

贾平凹

陈忠实

舒乙

刘再复

赵毅衡、虹影等

刘心武

余光中

鄢烈山

夏志清

白先勇

唐浩明

叶永烈

周海婴、周令飞

刘荒田

阎连科

陈晓明

郭敬明

王跃文

莫言

张炜

马悦然

广东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十年谈

当代文学名家专访

吴小攀 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十年谈 : 当代文学名家专访 / 吴小攀著.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4.8

ISBN 978-7-5360-7204-6

I. ①十… II. ①吴… III. ①文人—访问记—世界—现代 IV. ①K83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69524号

封面题字: 刘斯奋

出 版 人: 詹秀敏

责任编辑: 黄玉雯

技术编辑: 薛伟民 陈诗泳

装帧设计: 张 波 杜 卉

-
- | | |
|------|--|
| 书 名 | 十年谈: 当代文学名家专访
SHINIAN TAN; DANGDAI WENXUE MINGJIA ZHUANFANG |
| 出版发行 |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
|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
| 印 刷 | 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 23 号) |
| 开 本 | 880 毫米×1230 毫米 32 开 |
| 印 张 | 9.875 1 插页 |
| 字 数 | 210,000 字 |
| 版 次 |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
| 定 价 | 28.00 元 |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序 一

有一位新闻界老前辈告诫后辈：“做新闻记者拿起一支笔，不论记人记事，一经发表，就具有历史性质，应有责任感，不可任意而为。”

我十分赞同这番警语。

但是纵目四顾，当今能有多少新闻从业员受到感悟而责于专职，有所表现呢？在我看来，虽然少见，却是有的，我认识的吴小攀君就是难能可贵的一个。他以编就的《十年谈：当代文学名家专访》文集，证明了我的期待。

这部文集约15万字，历时十载的辛勤采访，以专访人物的形式，接触了当代中外有影响力的文化名人，以时间为序，围绕热门文化话题、人物自身经历而展开访问，涉及范围涵盖了文学、美术、音乐等文化领域，可能为当代文学史、新闻史提供有意义的史料。

从《十年谈：当代文学名家专访》里，我感到有可赞的特

点——

这是具有深厚文学、史学修养的访谈录。试设想如不具有主观的学识条件，就不可能引发各文化名人侃侃而谈，取得珍贵的识见，这是靠录音机式的口述不可同日而语的。

通过文集，可看到作者具有广泛的人缘，受人依赖、尊重的品格，与那些平庸弄虚作假的“访谈”又是不可同一而语的。

这是以勤奋学习，掌握各文化名人所专有的成就影响，才可能展开的访问。试以夏志清为例，他是研究中国文学史的学者，在国际间享有一定声誉，可是他也是受国内文化、文学界争议的人物，如果对他的历史背景、现状一无所知或知之浅薄，就流于敷衍的接谈了。其他文化名人的访问，也可作如是观。

此书专访中外文化名人之多，穷十年的功力以赴，是令人刮目相看的。十年后审视文化名人的访谈，可说已是历史的记录了，历史是不容饰伪的，著名的学术大师钱锺书最鄙视的是以曲学阿世、沽名钓誉之辈。因此我于感到共鸣而联想到唐代史学家刘知几，他对撰述历史提出过三项标准：德、才、识，他认为政治道德、表述的才华、卓越的胆识是应有的修养、条件。刘知几的提示要求是严格的，但是值得新闻工作者作座右铭。说到这里，我还想到梁启超，他是善于办报的，以舆论推动戊戌维新运动，不惧迫害，曾于“海天寥阔立多时”的环境中提出“十年之后当思我”的名言，正是反映了他独立思考的价值观，他如长江大河的文章风靡现当代，不仅文风表现情感于笔端，而且才识过人，树立典范。我在学习过程中就喜欢涉

猎《饮冰室全集》，从中获得教益不浅。

如今，我们的国家推行史无前例的改革开放宏伟事业，需要新闻从业员应富有独立思考的精神，推动谏言、建言以利国利民，而不应以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亲者讳这“三讳”的媚俗态度从事。拟此以观《十年谈：当代文学名家专访》的出版，我祝愿它不仅有现实意义，更有深远的影响，不负作者十年磨剑的抱负。

曾敏之

曾敏之，1917年10月出生于广西罗城，历任香港《文汇报》副总编辑、代总编辑，香港作家联合会会长，世界华文文学学会主席。1946年以《大公报》记者身份写下长篇专访《十年谈判老了周恩来》，是第一位独家专访周恩来的中国记者。

序 二

我一方面喜欢理论性较强的学术著作，另一方面也很喜欢如小攀做的这种人物采访。前者正襟危坐，后者却任意而谈，如行云流水。这本书很吸引人，因为所采访的对象多是我们所熟悉的当代文化事件的亲历者，文字很快让我置身于那些熟悉的时光，并引起我对于那些历史和思想线索的重新思考。

小攀的采访，始自上个世纪末，近至这两年，不过所涉及的事件主要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以后，借用一个术语，我可将其称为“后新时期”。“后新时期”不但是八十年代以来“新时期”的断裂，也是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历史以来的一个转折，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价值。以“口述”的形式，记录下这段历史，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时下不是时兴“寻访八十年代”吗？八十年代以后的历史，亦不必等到多年以后才想起来寻找。

九十年代以后，刘再复与李泽厚提出“告别革命”的概

念，对二十世纪以来的革命传统进行批判，导引了反激进主义的潮流。这个批判意义重大，因为它不仅仅是对于八十年代的反省，更是对于二十世纪以来中国革命传统的根本批判。从小攀的这次采访来看，近来刘再复的思想走得更远。他认为：“五四”接受西方文化，只接受了它“科学”、“民主”这些“用”的层面，而没有接受西方文化本体的层面——基督教文化。在他看来，缺少这个“体”，“用”就会出问题。刘再复还从基督教文化出发，对中国文化进行了批评。他认为：中国作家常常只是一个“仕”和“隐”的选择，缺少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进行灵魂论辩的大作家。较之于“五四”的全盘西化，刘再复的这种观点已经激进很多。长期居住在美国，很容易产生对于基督教文化的认同，这一点我很能理解，本人亦偏爱基督教。不过，刘再复以西方为本位对于中国文化、文学的贬斥，仍然有点出乎意料，有点“后殖民”的味儿。事实上，西方有两个思想源头，即希伯来与希腊。“五四”标榜“民主”、“科学”，事实上继承的是西方理性主义启蒙传统。将基督教作为西方文化的“体”，而将“民主”、“科学”的启蒙主义视为“用”，似乎并不准确。

小攀的访谈对象很大一部分是作家或批评家。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恰恰是一个热闹的话题。在启蒙主义失败后的九十年代，中国当代文学的主要特征就是市场化。我们在这里看到，贾平凹在访谈中说的不是文学，而是卖画，为了生计；陈忠实也说，已经丧失了写作的欲望。还有据说占据了市场却没占据文坛的八〇后作家，小攀也没有放过。虽然韩寒以惯有的姿态拒绝采访，郭敬明倒是接受了采访，但看得出两个人的对话套路不太能接得上。

对于当代文学的不满意，炒红了德国汉学家的“垃圾论”，虽然顾彬一再声称自己并没有全面否定中国文学的意思。偏偏北大教授陈晓明不以为然，抛出了“中国文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王蒙也提出“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结果受到了更为广泛的批评。批评派的阵容里，有南京大学的王彬彬、北师大张柠、清华的肖鹰、广东的林贤治等。小攀所在的《羊城晚报》，是当时论争的主要阵地之一，他也是此论争专题的策划组织者，对此中的情况应该相当了解。事实上，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坛也有不少杰出的作品，只不过泥沙过多，很不让人满意。八十年代“文化热”，文学成为社会焦点；九十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的经济转型，社会中心议题嬗变为制度变革、自由主义、市民社会等社会发展模式的讨论，文学已经沦为边缘，大概并非耸人听闻。

不过，中文写作仍然有一个新的亮点，未曾引起人们的注意，那就是海外中文创作的兴起。数年前，我曾应《中华读书报》之约，撰文谈十年来中国文学的成就，我认为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最值得瞩目的地方是文学自身视野的扩大，那就是将海外华文文学揽入视野，从中国文学走向了中文文学。1997年，由中国社科院在北京主持召开的“第九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首次以中国大陆文学、台港澳文学及海外华文文学为论述对象，形成了一种大的中文文学的概念。而到世纪末的时候，百年小说评选也开始将台港澳及海外文学纳入范围。文学研究的领域不再仅仅局限于大陆，而开始有意识地运用一种包括大陆内外的整体视野。

难得的是，小攀不像国内评论界那样盲视，他很注意采访海外作家以至评论家，采访对象包括白先勇、余光中、夏志

清、虹影、赵毅衡、严歌苓、刘荒田等。台港澳及海外作家浮出历史地表，中文文学概念的兴起，事实上是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成长为经济大国过程中必然的文化现象。由于海外作家、评论家完全不同的视野，采访中带出种种逸出我们研究视野的问题，这是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化的张力所在。

小攀的采访议题，还包括城市文化、流行文化，等等，这些都是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化最为新颖的领域。我们注意到，访谈并不是受访对象单方面的侃侃而谈，而是双方的对话和碰撞。看得出来，小攀对很多方面都有深刻的理解，很让人佩服。让人觉得，他似乎不是一个记者，而是一个文化研究学者。

在很多方面，我都不如小攀在行。在这里，我仅仅写下一点我自己的感受和思考，与小攀交流。

是为序。

赵稀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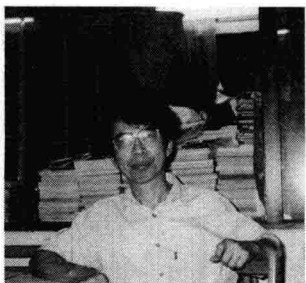
赵稀方，1964年出生于安徽芜湖，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学科评审组专家。著有《小说香港》、《翻译与新时期话语实践》、《后殖民理论》等。

目录



林贤治访谈录	1
洛夫访谈录	14
贾平凹访谈录	32
陈忠实访谈录	47
舒乙访谈录	66
刘再复访谈录	82
赵毅衡 虹影等访谈录	101
刘心武访谈录	119
余光中访谈录	124
鄢烈山访谈录	128
夏志清访谈录	135
白先勇访谈录	139
唐浩明访谈录	151
叶永烈访谈录	159
周海婴 周令飞访谈录	168
刘荒田访谈录	178
阎连科访谈录	185
陈晓明访谈录	192
郭敬明访谈录	213
王跃文访谈录	230
莫言访谈录	238
张炜访谈录	256
马悦然访谈录	261
北岛访谈录	268
格非访谈录	279
潘鸣啸访谈录	294
后记	300

林贤治访谈录



林贤治 1948年出生，广东阳江人。

诗人、学者。在他的写作中，文学和思想批评类的文章最有影响。他的《五四之魂》与《五十年：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曾传诵一时。他早年写作的《人间鲁迅》，以及不久前出版的《鲁迅的最后十年》，都曾引起广泛争论。著有诗集《骆驼和星》、《梦想或忧伤》，散文随笔集《平民的信使》，评论集《胡风集团案：20世纪中国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守夜者札记》、《自制的海图》、《时代与文学的肖像》、《午夜的幽光》；自选集《娜拉：出走或归来》等。

“所谓偏执，无非因为他爱一个东西非常专注，他不允许这个东西沾染了杂质，他要求纯粹……”

九月：鲁迅在广州

南下：爱情与光明

吴小攀：1927年1月间，鲁迅南下的原因是什么？在各种各样传记、历史记载里，有几种不同说法。您的看法呢？

林贤治：对于这个我们只能猜测，鲁迅一向没有明确的表示。“三一八”惨案后，鲁迅被列入北洋政府的黑名单，并因此有过短暂的避难生活。他对当时的政府是失望的，而当时的南方是光明的，国民党所在的南方代表着进步和光明，正在进行北伐。另外，许广平毕业了，她是广州人，要回广州找工作，他们当时已基本确定关系，而北京却没有地方可以堆放爱情的果实。妻子朱安也在北京，他没办法在北京待下去。几个

因素加起来，促使他离开黑暗的危险的北方南下。

吴小攀：为什么两个人开始的时候不直接从北京一起到厦门或广州，而是先分头到了厦门和广州，最后才到广州会合呢？

林贤治：两个人同居需要钱，当时鲁迅没什么钱，他的家庭支出比较大。还有，鲁迅还没有想好，他是一个犹豫的人，经常是瞻前顾后的，他在厦门和先到广州的许广平三天两头信来信往，仅讨论这个问题，就用了一个月时间。虽然在北京已经基本解决两个人的关系问题，但是还没有下决心解决同居问题。在北京的时候，两个人约定分头奋斗两年，攒了钱再说。第三，同在被政府通缉之列的朋友林语堂较早到达厦门大学任教，就把鲁迅介绍到了厦大，而厦门离广州也很近。

吴小攀：到广州和创造社“再造一条战线”是不是鲁迅南下的重要原因？有没有达到目的？

林贤治：我认为这不是他南下的原因，最多只能算很小的一个因素。他到广州后，看到广州的文艺几乎可以说是一片“沙漠”，他想在这里开出一块小绿洲，这靠他单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于是就想到联合创造社在广州的一些人一起播种文艺的种子。但是，创造社的人都革命去了，“元老”成仿吾就穿着军靴很神气地走在广州的大街上。这当然合作不成了，人家都去“革命”了，你还在搞文学？

吴小攀：爱情往往可以反映一个人的人生观。鲁迅与许广平的爱情关系是怎样的？他们确是在白云路的白云楼上开始同居生活的吗？

林贤治：鲁迅这个人不外露，他的爱情是热烈而深沉，不

像徐志摩到处挥手。这跟年龄有关系，跟性情也有关系，还跟两个人的经历有关。许广平是他的学生，鲁迅对许广平的爱在《两地书》和《腊叶》等文，以及许广平的两篇文章《风子是我的爱》、《魔崇》上可以看出来。据陈漱渝考证，两篇文章是她与鲁迅同居后不久写的。白云楼后期，许寿裳离开广州，剩下鲁迅和许广平两个人同住。当然，何时同居是私隐问题，考证这个是无聊的，萧红曾经问过鲁迅什么时候和许广平同居的，他说：不记得了，反正就是同居了！《魔崇》里不是提及时间和地点了吗？和去上海时的季节以及居住环境对照一下，还是白云楼比较切合。

吴小攀：许广平的家人对她与鲁迅的关系持什么态度？

林贤治：鲁迅和许广平的恋爱应该说是悄悄进行的。在上海正式同居后，很多人都不知道。许广平有一封给朋友的信中提到她广州的家人也不知道，当然，许广平的态度是非常开放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事后她的家人是反对的。

广州：偏枯和纯粹

吴小攀：鲁迅到了广州后有哪些主要活动？

林贤治：这个人基本上不活动，总体上是个不爱活动的人。只是在中大开学前，到香港作了两次演讲，一个是《老调子已经唱完》、一个是《无声的中国》，都是针对香港的封建专制文化，尊孔读经的风气。当然，当时整个中国也是无声的。

后来，他在芳草街开过一个小书店，叫北新书局，结果亏

了一百多块。

吴小攀：在广州除了演讲、写信，鲁迅的日常生活是怎么样的？

林贤治：他的日常生活枯燥乏味，两点一线：教室、卧室。偶尔去陆园、妙奇香等处饮茶、夜餐，也会逛逛公园，看看电影。他不喜欢应酬，是个生活在内心的人，跟现在的有些作家比，差得远了。

吴小攀：他当时的收入情况怎么样？

林贤治：鲁迅日记可以说是他的柴米油盐的流水账，里面记录得清清楚楚。的确，他的收入比当时一般普罗大众的要高，版税，教书收入还算可观，但说他收入十分丰厚，生活优越得不得了是错的，他的家累很重，一生都在担心如果没有了收入怎么办，摆脱不了经济压迫的阴影。

吴小攀：他在厦门心情是不好的，在广州呢？

林贤治：这个应该分前后两段。前段时间，心情还是愉快的，因为有了许广平，这个很重要，许广平作为他的助教，陪同左右，的确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大的亮色。后段，有两件事令他不愉快，一是顾颉刚来中大，二是国民党四一五大屠杀。广州可以是革命的策源地，也可以是反革命的策源地，应该说鲁迅是有预见的，但想不到他们会这样子杀人，用他的话说，他“被吓得目瞪口呆”。

吴小攀：他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辞职？

林贤治：应该说这是他辞职的主要原因。但顾颉刚的问题也是个问题，因为他在信中说“鼻来我走”，势不两立。

吴小攀：为什么对顾成见如此之深？

林贤治：有两个原因。鲁迅在《两地书》中把顾列入研究系，后来改作现代评论派。鲁迅“痛恨”之，说研究系“比狐狸还坏”。在女师大风潮中，现代评论派与鲁迅是对立的。顾反对当时代表了革命一方的国民党。但是，当北伐取得成功后，顾颉刚转向，也南下“革命”了。鲁迅在广州写了《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说到当革命取得成功，以前反对革命的也投奔革命了，你看，现代评论派的人南下，浩浩荡荡啊。革命一旦变得浩浩荡荡的时候，革命的精神就会变得浮滑。好，顾颉刚到了厦门，接着来广州，大家都来“革命”了，这不很好吗？然而，鲁迅感情上不能接受，他这个人就是这样，他要的是最纯粹的东西，他认为顾是投机，没有信仰。革命是需要信仰的，他们这帮人没有信仰。他讨厌这个。第二，在厦门大学的时候，他觉得他们这些人搞小圈子，营植私人，拉帮结派，在人格上鲁迅也蔑视他。鲁迅这个人太纯粹了，很苛刻的一个人。

吴小攀：偏执？

林贤治：所谓偏执，无非因为他爱一个东西非常专注，他不允许这个东西沾染了杂质，他要求纯粹，但在我们看来也许就偏执了。

吴小攀：鲁迅和顾颉刚之间没有个人恩怨？

林贤治：没有。

遮蔽：人道或党派

吴小攀：鲁迅中大辞职后仍留在广州三个多月，有人因此